



戴東原的哲學

胡 適 著

商務印書館

戴東原的哲學

此書有著者作識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初版

同普通學生用
每定價大洋壹元貳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胡適

發行兼
刷者
上海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THE PHILOSOPHY OF TAICHEN

By

HU SHIH, Ph. D.

1st ed., Oct., 1927

Student's Edition Price: \$1.20 postage extra

Popular Edition Price: \$1.40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All Rights Reserved

戴東原的哲學目錄

一 引論

二 戴東原的哲學

- 一 戴學與顏李學派的關係
- 二 戴學與漢學
- 三 論天道 一元的宇宙論
- 四 一元的性論
- 五 論人道
- 六 論理
- 七 關運欲之辨
- 八 權與一貫

三 戴學的反響

- 一 洪榜
- 二 程晉芳
- 三 段玉裁
- 四 章學誠
- 五 翁方綱
- 六 姚鼐
- 七 凌廷堪
- 八 焦循
- 九 阮元
- 十 方東樹

附錄

- 一 原善
- 二 孟子字義疏證
- 三 彭紹升與戴東原書
- 四 戴東原答彭紹升書

目錄

戴東原的哲學

一 引論

中國近世哲學的遺風，起於北宋，盛於南宋，中興於明朝的中葉，到了清朝，忽然消歇了。清朝初年，雖然緊接晚明，已截然成了一個新的時代了。自顧炎武以下，凡是第一流的人才，都趨向做學問的一條路上去了；哲學的門庭大有冷落的景況。接近朱熹一派的學者，如顧炎武，如閻若璩，都成了考證學的開山祖師。接近王守仁一派的，如黃宗羲自命爲劉宗周的傳人，如毛奇齡自命爲得王學別傳，也都專注在史學與經學上去了。北方特起

的顏元李燾一派，雖然自成一個系統，其實只是一種強有力的『反玄學』的革命；固然給中國近世思想史開了一條新路，然而宋明理學卻因此更倒霉了。這種『反玄學』的運動是很普遍的。顧炎武，黃宗羲，黃宗炎，閻若璩，毛奇齡，姚際恆，胡渭，都是這個大運動的分子，不過各人專力攻擊的方向稍有不同罷了。

約略說來，當日『反玄學』的運動，在破壞的方面，有兩個趨勢。一是攻擊那談心說性的玄學；一是攻擊那先天象數的玄學。清學的開山祖師顧炎武就兼有這兩種趨勢。他對於那高談心性的玄學，曾說：

『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，其行在孝弟忠信，其職在洒掃應對進退，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；其用之身，在出處，去就，交際；其施之天下，在政令，教化，刑法。雖其和順積中，而英華發外，亦有體用之分，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。』（日知錄十八）

他又說當日的理學家：

『不習六藝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綜當代之務，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，而曰「一貫」，曰「無言」，以明心見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實學。』（日知錄七）

『舍「多學而識」以求「一貫」之方，置四海之困窮不言，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。』

（文集與友人論學書）

同時他對於那先天圖象的玄學，也曾說：

『聖人之所以學易者，不過庸言庸行之間，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。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，畔也……』

『希夷之圖，康節之書，道家之易也。自二子之學興，而空疏之人，迂怪之士，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，而其易爲方術之書，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，去之遠矣。』（日知錄二）

這兩種趨勢後來都有第一流人才加入，繼續發揮。黃氏弟兄攻擊象數之學最力；毛奇齡也很有功；胡渭的易圖明辨可算是這一方面的集大成。心性的玄學在北方遇着顏

元李璣的痛勦，在南方又遭費經虞費密等人的攻擊。閻若璩指出古文尚書裏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』十六個字是出於道經的：這也可算是對那『危微精一』之學放了一枝很厲害的暗箭。但當日的『反玄學』大革命，簡單說來，不出兩個根本方畧：一是證明先天象數之學是出於道士的；一是證明那明心見性之學是出於禪宗的。兩者都不是孔門的本色。

反玄學的運動，在破壞的方面，居然能轉移風氣，使人漸漸地瞧不起宋明的理學。在建設的方面，這個大運動也有兩種趨勢。一面是注重實用，一面是注重經學：用實用來補救空疏，用經學來代替理學。前者可用顏李學派作代表，後者可用顧炎武等作代表。從顏李學派裏產出一種新哲學的基礎。從顧炎武以下的經學裏產出一種新的做學問的方法。戴東原的哲學便是這兩方面的結婚的產兒。

顏元 (1635—1704) 主張一種很徹底的實用主義。他自己經過亂離的慘痛，從經

驗裏體會出宋明儒者的無用；不但主靜主敬是走入了禪宗的路，就是程朱一派拿誦讀章句作『格物窮理』也是『俗學』而非正道。他自號爲『習齋』；習即是實地練習。他說，『格物』的物即是古人所謂『三物』，三物即是六德，六行，六藝。古人又說，正德，利用，厚生，謂之『三事』；事也就是物。他說，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』。

(與陸道威書)

他最恨宋儒不教人習事而只教人明理。他說，『孔

子則只教人習事。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』。

(存學編) 他因此極端崇信孔子『民可使由之，不

可使知之』的話，以爲那是『治民之定法』。

他說，『空談易於藏拙，是以〔宋儒〕舍古人六府六藝

之學而高言性命也。予與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，談性天，似無齟齬。一旦從事於歸除

法，已多謬誤，況禮樂之精博乎？昔人云，『畫鬼容易畫馬難』，正可喻此。』

(存性編) 畫鬼

所以容易，正因爲鬼是不能實證的；畫馬所以難，正因爲馬是人人共見的東西，可以實驗的。

（李燾也引此語，並說，「以鬼無質對，馬有證佐也。」）

顏元說，『學之亡也，亡其粗也。願由粗以會其精。政之亡也，亡其迹也。願崇迹以

行其義』（年譜）這幾句話最精當。宋人曾說儒門淡薄，收拾不住第一流的人才。（見宗果

的宗門式庫）所以宋儒起於禪宗最盛之時，自不容不說的精微奧妙，才免得『淡薄』之譏。

自宋至明的哲學史，除了陳亮葉適一班人之外，只是與禪宗爭玄競妙的歷史。顏元大

膽地指出他們說的太精了，太空了；他要人從那粗淺的藝學制度下手，從那可以實證的實

迹下手。這是顏學的要旨。例如他說性，老老實實地承認『性即是氣質之性』，『譬之目

矣，……光明之理固是天命，眶眇眇皆是天命，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，何者是氣質

之性』（存性篇）又如他論史事，很替王安石韓侂胄辯護；他說王安石的新法『皆屬良法，

後多踵行』；他誇獎韓侂胄伐金之舉是『為祖宗雪恥於地下』（宋史評引見年譜）他論史事，

頗推崇『權略』；他說，『其實此權字即「未可與權」之權；度時勢，審輕重，而不失其節，是

也。……………世儒等之詭詐之流，而推於聖道外，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，此陳同甫

（陳亮）所以扼腕也。』這些見解都可以見顏元講學不避粗淺，只求切用，不務深刻，只重實迹。

顏元的大弟子李塨（1659—1733）發揮師說，說的更圓滿細密，但仍舊遵守這種『由粗』『崇迹』的主旨。例如他說『道』只是『通行』，『理』只是『條理』。『在天在

人通行者，名之曰道。理字則聖經甚少。中庸「文理」與孟子「條理」，同言道秩然有

條，猶玉有脈理，地有分理也。易曰，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，理見於事，性具於心，命出於天，

亦條理之義也。』（傳注問）他在別處也說，『以陰陽之氣之流行也，謂之道。以其有條

理，謂之理。』（周易傳注）又說，『夫事有條理曰理，卽在事中。今日理在事上，是理別爲一

物矣。天事曰天理，人事曰人理，物事曰物理。詩曰，「有物有則」，離事物何所爲理乎？

（傳注問）

宋明的理學家一面說天理，一面又主張『去人欲』。顏李派既以『正德，利用，厚生』為主，自然不能承認這種排斥人欲的哲學。李塨在這一層上，態度更爲明顯。宋儒誤承偽尚書『人心維危，道心維微』的話，以爲人心是人欲，是可怕的東西，應該遏抑提防，不許他出亂子。李塨說，『先儒指人心爲私欲，皆誤。』「人心維危」謂易引於私欲耳，非即私欲也。他又說，『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，可乎？……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，可乎？』其失在「引」蔽二字，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。不然，「形色，天性」

（孟子）豈私欲耶？（大學辨業）

宋儒自二程以後，多說『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』兩句話。致知一方面，程朱一派與陸王一派大不相同，紛爭不了。但主敬一方面，無論是程朱，是陸王，總沒有人敢公然出來否認的。顏李之學始大聲疾呼地指出宋儒的主敬，只是佛家打坐的變相，指出離事而說敬，至多不過做到禪門的惺惺寂寂，毫無用處。李塨說，『宋儒講主敬，皆主靜也。主

一無適，乃靜之訓，非敬之訓也。」

他又引一位潘用微

（寧波人，與黃宗義萬斯同同時，著有求仁錄）

等書。

的話道：『必有事之謂敬，非心無一事之謂敬。』

他又說：『聖門不空言敬。』「敬

其事」，「執事敬」，「行篤敬」，「修己以敬」，「孟子所謂必有事也」。

（以上皆見傳注間）

當日一班排斥陸王而擁護程朱的人，如張伯行之流，都說陸王主靜而不主敬，所以入於禪。

李塋指出宋儒主敬都只是主靜。

『主靜立人極，周子之教也。』

靜坐雪深尺餘，程朱之

學也。

半日靜坐，半日讀書，朱子之功課也。

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。

（年譜）

顏李的學派和宋明理學的根本區別有兩點：理學談虛理，而顏學講實用；理學主靜主

敬，而顏學主動，主習事，主事功。

有人說程朱與孔孟『隔世同堂』，似不可排斥。

顏元說：

『請畫二堂，子觀之。』

一堂上坐孔子，劍佩，纓決，雜玉，革帶，深衣。

七十子侍，或習禮，或鼓琴

瑟，或羽籥舞文，干戚舞武；或問仁孝，或商兵農政事；服佩亦如之。

壁間置弓矢，鉞，戚，簫，磬，算

器，馬策，及禮衣冠之屬。

一堂上坐程子，峨冠博帶，垂目坐，如泥塑。

如游楊，朱陸者侍，或返

觀靜坐，或執書伊吾，或對談靜敬，或搦筆著述。壁上置書籍，字卷，翰研，梨棗。此二室同

否？（年譜）

李塋也有同樣的觀察：『聖學踐形以盡性。耳聰目明，踐耳目之形也。手恭足重，踐手足之形也。身修心容，踐身心之形也。踐形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。今儒墮形以明性。耳目但用於誦讀，耳目之用去其六七。手但用於寫字，手之用去其七八。足惡動作，足之用去九。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，身心之用亦去九。形既不踐，性何由全？此一實，一虛，一有用，一無用；一爲正學，一陷異端；不可不辨也。』（年譜）

以上說清初的實用主義的趨勢，用顏李學派作代表。顏李學派是一種反對理學的哲學，但他們說氣質是性，通行是道，條理是理；說人欲不當排斥，而靜坐式的主敬是無用的；說格物在於『犯事實做其事』，而知識在於實習實行；說學在於習行，而道在於實用（三物，

三事）——這也是一種新理學了。在那個排斥玄學的空氣裏，這種新理學一時也不易成立。況且當日承晚明的流離喪亂之後，大家歸咎於王學，程朱的學派大有復興的樣子。

大師如顧炎武，他雖痛斥王學，而對於朱熹他始終敬禮。朝廷之上也正在提倡程朱；而

在野學者的風氣也與朱學『窮理致知』『道問學』的宗旨很接近。所以提倡『實學』是多數學者所公認的，而攻擊程朱是他們不能一致承認的。況且當日南方的理學大師如張

履祥，如呂留良，如陸隴其，都是朱學的信徒。陸隴其竟說：『愚近年所見，覺得孟子之後，至

朱子知之已極其明，言之已極其詳；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，惟即其所言而熟察之，身體之，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，則天下之學無餘事矣。』（三魚堂文集六，答某）在這個極端

『述朱』的空氣裏，顏李自然成了叛教的罪人。顏李學派所以受排斥（江藩、阮元、唐鑑等人記載清

代學術，都不提及顏李；方苞作李塈的墓誌，竟說他後來不是顏學的信徒了；程廷祚是顏李的南方傳人，而程晉芳爲他作墓誌，竟不提及顏李一個字。這都是顏李受排斥的證據。）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

其次，當日反玄學的運動之中還有一個最有力而後來成績最大的趨勢，就是經學的復興。顧炎武說：

『……躁競之徒，欲速以成名於世；語之以五經，則不願學；語之以白沙陽明的語錄，則欣然矣，以其襲而取之易也。』

（與友人論門人書）

他又說：

『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。古之所謂理學，經學也，非數十年不能通也。……今之所謂理學，禪學也，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，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。』

（與施愚山書）

用『經學』來代替『禪學』，這是當日的革命旗號。『經學』並不是清朝獨有的學術，但清朝的經學卻有獨到的長處，可以說是與前代的經學大不相同。漢朝的經學重詁訓，

名爲近古而實多臆說；唐朝的經學重株守，多注『注』而少注經；宋朝的經學重見解，多新義而往往失經的本義。清朝的經學有四個特點：（一）歷史的眼光（二）工具的發明（三）歸納的研究（四）證據的注重。因爲清朝的經學具有這四種特長，所以他的成績最大而價值最高。

第一，歷史的眼光只是尋源溯流，認清時代的關係，顧炎武說：

『經學自有源流。自漢而六朝，而唐，而宋，必一一攷究，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，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。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，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。』

（文集四，與人書四）

論字必本於說文，治經必本於古訓，論音必知古今音的不同，這就是歷史的眼光。懂得經學有時代的關係，然後可以把宋儒的話還給宋儒，把唐儒的話還給唐儒，把漢儒的話還給漢儒。清朝的經師後來趨重漢儒，表彰漢學，雖然也有過當之處，然而他們的動機卻只是